

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丛书·专题系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 权力集团研究

著 | 周方治 郭 静 周石丹
唐 慧 郭继光 李永春

Why Rising and Falling:
the Inspection of Ruling Power Groups
in Five East Asian Countri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丛书·专题系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 权力集团研究

著 周方治 郭 静 周石丹
唐 慧 郭继光 李永春



Why Rising and Falling:
the Inspection of Ruling Power Groups
in Five East Asian Countri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 / 周方冶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7426 - 5

I. ①东… II. ①周… III. ①政治—研究—东亚
IV. ①D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47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王 称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作者简介

周方治，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亚政治转型研究、泰国政治与社会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3 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主要成果有《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列国志·泰国》等。

郭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比较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发展比较研究、政党政治、政治社会运动、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等，主要成果有《政党轮替的政策价值：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政治分析》《争取权力和扩大权利：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社会运动》等。

周石丹，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研究、日本政治发展、日本国会与政党、日本政治与外交决策等，主要成果有《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草根经济与民主政治》《农政学的一个课题：日本农业保险制度》等。

唐慧，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印度尼西亚语教授，博士，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尼西亚社会与文化、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要成果有《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变》《印度尼西亚研究》《马来古典文学史》《印度尼西亚概论》《文莱文化概论》《马来西亚文化概论》等。

郭继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研究、东南亚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及影响等。

李永春，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北亚国际政治、朝鲜半岛问题等，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两部，主要成果有《日本和朝鲜封建政权改革比较（1850—1860 年代）》《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等。

代序言：中国的崛起需要深入了解他国

《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是国内政治学者与国别问题专家共同努力的学术创新成果，为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政治发展的脉络、规律与趋势。

那么，为什么要深入研究亚洲国家的政治发展？为什么要以国人未曾有过的方式研究外国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当代中国学者要为国家崛起而了解世界。这也正是几十年前美国学者做过的。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及战后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学术界是当代政治学的执牛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要的政治学成果基本上出自美国。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应算是战后比较政治学的开篇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为占领日本和战后管制日本做准备，美军需要了解日本的国情与文化。当美、日海军在太平洋上激战正酣之际，美国政府邀请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历史、国情和文化进行研究。本尼迪克特很快写出了那部后来闻名遐迩的研究报告，实际上是一本日本占领手册。本尼迪克特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自然善于总结、提炼和概括，后来她把那本“占领手册”提炼成了一部学术著作，就是那本被誉为文化心理学与现代日本学杰作的《菊花与刀》。此后，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和建构、管控世界秩序的需要，美国政府策动，由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出面，组织、资助美国学术界对当时美国面对的一系列涉及社会治理与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塞缪尔·亨廷顿和曼瑟尔·奥尔森等众多学者的研究与学术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亨廷顿在研究了一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进程之后，对于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社会转型作出了规律性的总结与概括，部分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出现政治不稳定现象的原因，为预测和应对发展中国的政治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奥尔森以研

究美国工人运动见长。他通过对工会以及罢工行动的观察与研究,发现了人类策动、组织和维持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奥尔森的理论对于认识和控制社会运动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以亨廷顿与奥尔森为代表的学者及他们的理论成果源自美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在美国崛起、称霸世界的历史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亦被称为“冷战政治学”。这些学术理论与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本尼迪克特·亨廷顿、奥尔森以及政治学家达尔、李普赛特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之所以嵌入了学术的历史,正是因为他们恰逢那个不平凡的时代,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崛起作出了学术贡献。他们的学术成就生发于时代需要,强国崛起成就了他们对新知识体系的发现。

今日中国迎来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崛起的中国需要世界眼光,需要发展战略。中国崛起迫切需要智力支持,需要新的知识。在今日中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层次而上升至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运动的境界。时代与国家的需求,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进一步讲,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践又为中国人认识现代化及政治发展规律提供了直接的经验。今天的我们,再也不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懵懂无知地观看世界,再也不会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头昏目眩、六神无主了。今天的我们,已具有了自身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的经历,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是“过来人”了!这样的经历与体验使我们初步具备了客观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基础。时代提出了要求,时代给了我们条件,我们幸运地承接了这一历史的使命,我们幸运得犹如当年美国学者构建“冷战政治学”那样参与构建了中国的“崛起政治学”。

从2008年开始,我们以政治学者与国别问题专家相结合的方式,启动了亚洲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我们首先对日本、韩国、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了实地调研,进行了大量的当事人采访和现场观察,并于2011年出版了《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一书。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初步形成了一些有关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理论认识。

首先是政治体系的结构问题。

在我国,关于这一问题已有的政治学知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

梁启超为主开辟的，以宪法、法律与机构为着眼点的政治体系的宪政学说；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法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国体—政体”学说。二者有一定关联又有一定的认识上的递进关系。

梁启超是我国最早的政治学家之一，他根据在国外多年考察游历所获得的政治知识及亲身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对中外政治体制进行了梳理、概括与介绍，尤其是依据宪法、法律和政治机构三大要素，对近现代西方政治体系进行描述与概括。梁启超关于政治体系的宪政学说因其具有初始性、开创性而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依然是中国政治学教科书介绍政治体系的基本范式。如教科书上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介绍不外是：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是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的总统制、两党制、普选制和司法独立的国家。

宪政学说依据宪法、法律和机构从规范意义上描述政治体系，是对政治体制现象与外观层面的揭示，具有基础性的认识意义。但政治体系实际运行毕竟与法律规定和文字描述有很大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法的学说以“国体”与“政体”概念揭示了政治体系中阶级统治的实质。宪政学说隐含着一个关于政体性质的命题，即政治体系是一个以自由与平等为基本价值的整合与分配社会利益的体系，所有的宪法和法律都是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认为，政治体系内部的阶级关系是不平等的，政治权力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马克思主义将法律上平等的政治关系与实际上不平等的政治关系的事实抽象和概括为一对概念范畴：国体与政体。按毛泽东的解释，政体是国家的形式，而国体是国家的实质，即谁统治谁、谁压迫谁的实质性的政治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国体”与“政体”概念超越了传统宪政学说的认识水平，把政治学关于政治体系的认识从规范性、表面化层面推进到了实际政治关系、政治实践的层面。

“国体”与“政体”概念虽然推进了关于政治以及政治体系的认识，但这个概念是论断性的，是一个政治哲学层面的分析性的概念，它没有具体地揭示出政治体系中宪法、法律、机构与实际政治权力的表现形态和相互关系。确切地讲，“国体—政体”学说没有说明国体存在的具体形态以及国体实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具体机制。因此，这一理论还需要进一步阐发和深化。

在对亚洲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发展的调研和比较研究中，我们逐渐发现

和意识到政治体系的内部结构问题，并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实中的政治体系是以何种形态存在的？宪法、法律等规范的政治制度与实际权力运行、与政治实践是怎样产生关系的，即政治体系运行的实际形态是怎样的？

在对多国和地区的调研与考察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是基本相同或相似的，但政治体系的实际情况、实际运行却有很大差别。在有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的主要社会集团可以超越或操弄宪法、法律，控制社会的实际政治进程。随着调研的深入，我们发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主要以宪法、法律、机构组成的政体结构之下，还有一个实际上决定着国家或地区政治进程以及重大决策的政治权力结构，即存在着掌握和控制着实际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阶层或集团。我们进一步发现，掌握和控制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与社会的利益结构又有着必然的、密切的关系。一些掌握主要社会资源的社会集团掌控和影响着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重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矛盾影响着权力结构中政治精英的关系，即社会利益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政治权力结构。

因此，我们提出了政治体系的内部结构问题，并将政治体系划分为政体结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三个层面，是一种合理的抽象，目的在于为认识政治体系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第一，从这三个基本层面及其相互关系中认识和解释政治体系的性质、特性和功能，可以比较全面和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和片面地把握和理解政治体系；第二，三个层面的立体认识可以提供一个对于不同政治体系进行比较的框架，而传统的从单一宪政体制层面的比较无法得出有价值的认识；第三，三个层面的综合有利于对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动趋势作出预测。

其次是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

亚洲政治发展研究，帮助我们在政治发展的原因、动力及进程等方面获得了新的理论认识。其中，我们的核心发现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新兴社会集团获取政治参与和获取政治权力的努力导致政治体系的变化。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

我们认为，工业化及其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当代政治发展的基础性原因。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的结构变动，既可以是政治体系内部权力结构、宪政体制的变化；也可以是体系的更替，旧制度、旧体系被新制度、新体系所代替。政治发展的原理反映了政治体系结构性变动以及政治体系

更替的发生机制，即政治发展的原因、动力及一般进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所发现的政治发展的动因在一定程度上具体表明了，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基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的。

亚洲各国的政治发展，即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的改变，国家政权的更迭，从根本上讲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结果。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相关因素如下：

第一，工业化导致新社会集团出现。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流动、身份改变、财富增加和社会集团关系变化，其中最为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变化是，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出现，即社会学所说的“巨型社会聚集体”的出现。我们称之为“新兴社会集团”。

第二，新兴社会集团政治参与引发政治体系权力结构变动。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体系的“陌生人”“后来者”，不具备特定的法律地位，缺乏政治权力，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由此产生新兴社会集团政治参与的意愿和动力。

第三，政治体系中的政体结构与权力结构吸纳政治参与存在相悖作用。一般情况下，政体结构具有开放性，而政治权力结构具有封闭性，政体结构一般在法律意义上平等对待各个社会集团及其利益诉求，通过平等竞争分配利益和权力。但政治权力结构为既定精英集团所掌握，既定精英集团具有排斥权力分享倾向，导致新兴社会集团对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参与度强，以争取分享权力。

第四，新兴社会集团通过政治参与进入政治权力结构，进而改变权力结构和政体结构，导致政治体系变化及政治发展。政治体系变化与政治发展同时也取决于既定权力精英集团的适应性，既定权力精英集团自身调整能力和对于新兴集团的制约与整合能力决定着政治权力结构及政体结构变动的方式和程度。

概括地说，政治发展的动因是工业化阶段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产生的新兴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是新兴集团参与和既定权力精英围绕政治权力的博弈，新兴集团的参与意志和能力、既定权力精英的制约和整合能力等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最终进程。

再次是政治发展的策略问题。

自欧美先行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后，亚洲便陷入了

历史的被动与“落后挨打”的境地。殖民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威胁是自近代以来亚洲国家的共同历史遭遇与经历。

独立建国是亚洲国家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政治前提,但如何找到符合本国本地区实际、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却是艰难和曲折的。亚洲地区是在欧美先期实现了工业化、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已经形成、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已经不再适用于后发展国家实现发展的时代条件下,走上发展之路的。后发展的条件与环境迫使亚洲国家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于时代条件和本国环境的独特发展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及地区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建立了一种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即实行开放“权利”与关闭“权力”的对冲体制。一方面,在经济社会领域,一定程度上开放经济社会权利,扩大社会自由,通过保障人民的权利,建立起普遍的发展预期,以刺激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集中权力于政治精英阶层,强化国家政权,依靠政权力量推动国家工业化的战略性发展。我们称这种体制为:亚洲的威权体制。

工业化进程既是物质生产进程,也是社会关系发展的进程,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社会转型”。所谓“社会转型”一般具有四项主要表现: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工业化、现代化将所有社会成员卷入其中,人们渴望实现流动、改变身份、拥有财富,而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是经济途径,即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其追求;二是政治途径,即通过政治活动、集体行动,通过争取政治权力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来获取利益。

如果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开放政治权力,无疑就是开放社会流动的政治途径,必然吸引社会集团通过政治参与获取利益,由此导致各个社会群体和集团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而社会进程主题转向政治参与、政治斗争,其结果往往是社会动荡,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中断工业化的进程,使社会陷于混乱。在工业化进程中权利与权力双重开放,能够刺激社会集团通过政治活动改变法律、政策,即直接改变社会利益分配规则和利益格局来获取有利地位和更多利益,但这种分配性激励的结果是将社会引向广泛的集团斗争和社会冲突,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严重情况下则会阻断和断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纵观亚洲多国及地区工业化的历史，在较短时期内成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部分亚洲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在开放权利通道的同时，关闭了权力通道，其关键效应在于防止和阻断了工业化阶段和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集团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直接争夺国家政权，进而直接改变利益分配规则的活动，从而将社会参与的潮流导向了生产活动、经济领域，引导社会群体与集团通过经济行为、经营活动，而不是通过政治性活动争取社会流动、身份改变和占有财富的机会。这种特殊的发展策略激励和促进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通过经济活动获取利益，从而推动了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将“对冲”体制所产生的这种效应称为：生产性激励。

从2012年以来，我们开始在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继续推进亚洲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我们在横向上进一步拓展对象国实地调研的范围，先后将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菲律宾、缅甸等国纳入研究视野，通过比较研究，印证和发现新的理论认识。2014年，我们修订再版了《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并出版了《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一书，从而在九国一区的研究基础上形成了更完善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在对“快亚洲”与“慢亚洲”的对比研究中，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结构对政治发展影响的理解和把握。

通观亚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为尺度，人们可以大致将亚洲国家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一类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以阶段性实行“对冲”型体制，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堪称“快亚洲”；另一类以菲律宾、印度为代表的以长期实行权力分散型的民主政体国家，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社会问题丛生，堪称“慢亚洲”。

从现当代世界历史视野中观察，欧洲、北美、拉美和非洲尽管内部也存在差异，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如此差异，明显地存在两种发展模式的并不多见。亚洲国家作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作为后发国家，形成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两大模式、两种道路，应是亚洲工业化及政治发展的一大特色，应算是亚洲一大“洲情”。

为什么东亚地区一些国家可以选择“对冲”体制及策略快速地实现工业化，而菲律宾与印度则未能复制“东亚模式”？为什么菲律宾和印度

基本上遵循战后初期选定的政治制度与体制走过了一条缓慢而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将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等与菲律宾、印度工业化进程和政治发展道路进行对比,我们得出的基本认识是: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决定工业化时代政治制度与体制以及发展策略选择与实施的基础性因素。

东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中凡是采取所谓“东亚模式”的国家,如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在工业化进程开启之前或启动之初,都经历了社会结构的较大变动。或由于战争如韩国,或经过改革如日本、台湾,或经历革命如越南,或因为社会动荡如印度尼西亚。东亚近现代史上的社会动荡与变革性质、类型虽不同,但却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导致了相似结果,即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原有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社会阶层及利益群体间原本固化的界限有所松动,社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扁平化”趋势。

东亚地区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与改变与后来的工业化进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结构变化为工业化条件下的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而社会流动则是工业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结构变动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其次,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传统的利益格局和社会规则也随之遭到破坏,甚至消失,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地位和垄断能力弱化,甚至消失,这样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以实现国家发展为价值目标和在一定程度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精英集团掌控国家政权创造了条件,即形成了出现西方学术界所称“中性政府”的可能性条件。

与东亚模式及东亚道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和印度的体制与道路。菲律宾与印度经历了长期殖民统治,西方殖民者为统治分散化的国家采取了地方与社会相对自治的策略与体制并长期实行,菲律宾、印度两国的这种殖民地经历十分相像。因西方殖民者长期的统治策略与体制的实施,菲律宾和印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并高度稳定与固化。

策略与结构,是亚洲工业化以及相应的政治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相关因素。在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的部分亚洲国家,采取了一种导向性和约束性的特殊的政治体制及发展策略,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导向了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广泛而强劲的动力,同时约束了政治参与,限制了政治纷争,在一定阶段内维持了社会稳定。在这种被我们称为“对冲”机制的作用下,部分东亚国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在

社会结构未曾发生重大改变的部分亚洲国家，不具备采取“快亚洲”国家的相应体制与策略的条件。这些“慢亚洲”国家在传统社会结构之下，工业化依然在缓慢地前行，与此同时社会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得以一定程度的保留，社会在温和地改变和进步。

另一方面，我们在纵向上积极深化已有的理论认识，并努力将其规范化和体系化，力求为亚洲政治发展提供中国视角的研究范式。“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课题组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成立，充分发扬了我们一直提倡的政治学者与国别问题专家相结合的研究风格，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不仅有效整合了政治学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学术资源，而且引入了国内兄弟院校的科研力量，形成了具有活力的创新平台。课题组以政治权力集团为切入点，在政治结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的三结构框架下，通过构建政治权力集团的“同心圆”模型，对日本、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亚五国的政治发展动力、路径与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相关国家的政治环境与发展趋势提供了客观依据。更重要的是，“同心圆”模型的提出，也为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重要分析工具，有助于从结构层面对其他国家进行深入解析，并在对象国间进行横向对比，进一步深化对各国异同点的理解和把握。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而对比较政治研究提出了更高也更迫切的创新要求。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与国别问题专家开始加入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创新队伍。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像《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这样具有创新精神的学术成果问世，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学术和理论基础。

房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2015年12月12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政治权力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2)
一 政治权力集团的基本概念	(2)
二 政治权力集团的常见类型	(9)
第二节 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	(17)
一 “核心—边缘”的同心圆模型	(17)
二 政治权力结构的基本形态	(18)
第三节 政治发展的动力与路径	(30)
一 根本动力：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改变	(31)
二 直接动力：新旧权力集团的利益冲突	(33)
三 路径选择：政治权力边界的制度建构	(36)
第二章 日本	(40)
第一节 明治宪法背后的权力斗争	(40)
一 明治政府的绝对主义原则	(40)
二 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诉求	(42)
三 明治初年的政治权力博弈	(44)
四 明治宪法的政治集权体制	(47)
五 藩阀政治的单极自律形态	(49)
第二节 从政党政治到军阀政治的权力结构调整	(53)
一 新兴权力集团的政治崛起与权力诉求	(53)
二 政党政治时期的寡头自律形态	(57)
三 军阀政治时期的单极自律形态	(64)
第三节 “55 年体制”兴衰的过程与原因	(68)

一 战后初期的体制改革与政治博弈	(68)
二 保守派政治主导地位的形成与发展	(77)
三 “55 年体制”的寡头自律形态	(80)
四 自民党的变化与“55 年体制”终结	(88)

第三章 韩国

第一节 军人威权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92)
一 军部精英主导下的威权统治	(93)
二 财阀与威权政府的关系	(99)
第二节 财阀金权政治的崛起与扩张	(108)
一 民主化：军人集团的分裂和威权主义体制的 解体	(109)
二 财阀与文人政府的关系	(116)
第三节 韩国民主化的问题及其课题	(123)
一 代理政治：从“充满活力的主体”变成“被动 消极的支持者”	(124)
二 排挤劳工集团：“劳工”和“参与”的缺失	(128)
三 韩国民主化的课题：经济民主化	(132)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

第一节 印尼政治权力集团类型	(135)
一 民族主义集团	(136)
二 军人集团	(137)
三 伊斯兰集团	(138)
第二节 从威权政治到多党竞争的权力结构转型	(140)
一 从议会民主到有领导的民主	(140)
二 从威权政体到多元民主改革	(144)
三 民主化进程初见成效	(150)
第三节 民主改革中伊斯兰集团的崛起	(158)
一 伊斯兰集团政治地位的兴衰演变	(158)
二 伊斯兰集团的重新崛起	(160)
三 伊斯兰集团的未来发展前景	(163)

第四节	民主改革中印尼军队角色的重构	(166)
一	印尼军队干预政治的启端	(166)
二	印尼军队政治角色的巩固	(168)
三	民主改革中军政关系的变化	(171)
第五章	泰国	(180)
第一节	泰国政坛的派系力量构成	(180)
一	王室—保皇派	(180)
二	军人集团	(181)
三	曼谷政商集团	(182)
四	城市中产阶级	(183)
五	地方豪强集团	(184)
六	新资本集团	(185)
第二节	泰国政商关系发展的过程、动力与前景	(186)
一	泰国政商关系的调整与转型	(187)
二	泰国政商关系的演化条件	(194)
三	泰国政商关系的演化前景	(197)
第三节	宪政多元化与权力边界重构	(198)
一	泰国宪政体制的多元化趋势	(199)
二	新旧政治力量的权力制度化诉求	(207)
三	宪法修正案的政治博弈	(213)
四	宪政体制的多元化前景	(217)
第六章	马来西亚	(219)
第一节	马来西亚政治权力集团的演变	(219)
一	权力协商时代	(220)
二	权力霸权时代	(222)
三	权力制衡时代	(233)
第二节	马来西亚政治权力集团演变的原因	(235)
一	经济发展	(236)
二	巫统内部的分裂和斗争	(238)
三	根深蒂固的腐败	(241)

四 社会抗争	(243)
五 新媒体的崛起	(245)
第三节 马来西亚政治权力集团演变的前景	(246)
一 超越族群政治	(247)
二 政党轮替	(248)
主要参考文献	(250)
后 记	(258)